3..陈望道

第一个把《共产党宣言》（英文版）翻译成中文的陈望道。

《共产党宣言》是马克思主义入门经典，此书气势磅礴，富有鼓动性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的中国正在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，陈独秀、李大钊两位共产党的创始人在北京读过此书的英文版，深为赞叹，二人都认为应当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。戴季陶在日本留学时，曾买到一本日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，亦打算译成中文，那时的戴季陶思想颇为激进，倾向于共产主义。但他细细看了一下后，就放了下来，因为翻译此书太难了，要求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，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。后来，戴季陶回到上海，主编《星期评论》，他便着手物色合适的翻译者。《民国日报》的主笔邵力子是一位奔走于上海滩各界的大忙人，他的思想也颇为激进。邵力子得知此事，就向戴季陶举荐了陈望道。

陈望道与邵力子书信往返较多，二人都常为《民国日报》和《觉悟》副刊撰稿，邵力子深知陈望道功底不凡。于是，戴季陶向陈望道提供了《共产党宣言》日译本，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《共产党宣言》的英译本，供陈望道对照翻译。当时，中国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把《共产党宣言》译成中文，但都是仅仅翻译其中的一部分，而且译的都不准确，有些地方翻译得甚至谬误可笑。陈望道就将以往各家所译片断也找来作为参考，上个世纪50年代周恩来曾就此事问过陈望道，《共产党宣言》最初是依据什么版本译的，陈望道说主要是据英译本，同时参考日译本。

1920年2月下旬，陈望道秘密回到老家分水塘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
3-4月份，陈望道将《共产党宣言》译完，随即携译稿到上海，准备在《星期评论》连载，但当他到上海的第二天，该刊便停刊了。恰在这时，陈独秀的《新青年》编辑部也刚到上海不久，应陈独秀之邀，陈望道参加了《新青年》编辑工作。当时陈独秀、李达、李汉俊、陈望道经常在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建党问题，于是便组织了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”， 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，印行《共产党宣言》成了当务之急，当时印刷经费十分困难，为此，陈独秀就跟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商议，魏金斯基当即就筹措一笔经费。随后，就在辣斐德路（今上海复兴中路）成裕里12号，租了一间房子，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，取名“又新印刷厂”。陈望道翻译的《共产党宣言》一书也是又新印刷厂承印的第一本书。首版封面五分之四的篇幅是马克思肖像，这是中国境内第一次在印刷品上出现马克思的肖像，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文全译本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共印了一千册，很快售尽，但人们也发现封面把《共产党宣言》错印成了《共党产宣言》，于是，同年9月在改正版面后进行了第二次印刷，封面马克思肖像也由红色改印成蓝色，再版，又印了一千册，依然很快售完。到1926年5月止，已经重印17版之多。后来国民党将《共产党宣言》定为“禁书”，不准再版，见之即查缴。

陈望道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负责人之一，在组织支持下，他开办外国语学校、平民女校以及职工补习夜校，向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。外国语学校实际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公开活动的场所，为党向国外派遣了一批留学生、培养了大批干部。平民女校是吸收“一些觉悟的女子，为反对三从四德，被他们的家庭、学校赶出来，我们办学校，接受他们。丁玲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。”

陈望道是早期工人运动的重要发起者，直接参与筹建了上海机器工会、印刷工会、纺织工会、邮电工会，通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。初期的工运，主要是启发和培养工人的阶级觉悟，支持他们搞经济斗争。为此，陈望道多次向工人发表关于劳工神圣和劳工联合的演说，进行鼓动宣传工作